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 原著 大庭修

● 翻译 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

● 杭州大学出版社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  
流播日本之研究





《江戸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

日本同朋舎 1984年6月15日出版发行

本书据 1986年10月1日第二次印刷本翻译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 原 著 大庭 修
- 翻 译 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
- 杭州大学出版社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  
流播日本之研究

#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中方顾问 沈 善洪

日方顾问 石田一良

主 编 王 勇

## 中国的日本研究：一个简短的回顾

——代丛书序

中国历朝正史对日本的记载，不失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贵史料；但《宋史》（14世纪）以前的官撰史书，均把“日本传”归入四夷之部，故尽管记奇风异俗、朝贡封赐颇详，其本身还称不上是对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明史·日本传》自不待言，书名冠以“日本”的著作亦竞相问世。仅以嘉靖至万历约百年为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举出《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考》、《日本一鉴》、《经略复国要编》等，现已佚散的估计数量也很可观。明朝异乎寻常的日本研究热，究其原因，与倭患触发的海防关系密切，《日本考略·自序》云：“于兹猥属为《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可见这些著作类似于敌国便览，偏重于概况罗列，而轻于研究探讨。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复冲击下，古老的汉字文化圈渐趋解体，尤其是日本率先维新成功，踏上“脱亚入欧”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刮目视之。在这种背景下，清代出现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赖文献和传闻研究日本的时代遂告结束，中国人终于走出国门，通过实地体验，为后世留下丰富的访日记录，如《日本日记》、《使东述略》、《使东诗录》、《日本纪游》、《谈瀛录》、《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东游日记》、《扶桑游记》、《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愚斋东游日记》等等，无

## 2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前代所无法相比的。然而,细读这些访日见闻,发现中国人所关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层面,而非传统的思想文化,故可谓之“曲线的西方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堪称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丰碑。

千余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反观中国,自古以“华夷”色镜视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时,恍然犹如隔世,弱邻竟成强虏。甲午一战,“泱泱大国”败给“蕞尔小国”,从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观研究对方的基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发过慨叹:“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读古书,足已自封,……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种状况至民国更甚,戴季陶有感于“中国”这个题目被日本人无数次解剖、化验,而国人不愿读日本字、不愿听日本话、不愿见日本人,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于是发轫写了部《日本论》,算是填补了空白。清末以降,国人负笈东游者剧增,他们通过日语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却很少有专门研究“和学”的。“五四”前后,周作人、钱稻孙等致力于介绍日本文学,因囿于文人士夫圈子,终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般腾飞以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长期困扰日本研究的两大障碍——“华夷思想”与“敌国意识”渐被清除,短短数年时间,大学的日语专业成倍增加,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设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热潮,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席卷全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日本的翻译、著作、论文以几何级数猛增,这表明“日本”这个题目,终于被中国人放到手术台上认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显的偏向,即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分野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而艺术、民俗、思想、宗教、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则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

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难作出精确的界定,或可比作对“日本”这个题目的综合解剖。从局部研究过渡到综合研究,是日本

研究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其重要性渐为人们所认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自 1985 年始设日本社会文化硕士专业,杭州大学于 1988 年承办日本文化史大学师资培训班,均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兴蓄积了人才。鉴于国内迄今尚无一块属于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园地,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这套丛书,显然正逢其时。但愿这套丛书能为日本文化研究摇旗呐喊,为中日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本丛书聘请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顾问,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石田一良博士为日方顾问,主编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担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编务。

编 者

1990 年 10 月

# 目 录

## 中文版序

### 本篇 书籍输入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b>序 章 日本的汉籍输入</b> .....	(3)
第一节 研究角度 .....	(3)
第二节 日唐关系 .....	(5)
第三节 日宋、元、明关系 .....	(9)
<b>第一章 江户时代汉籍输入概况</b> .....	(19)
第一节 唐人贸易概况 .....	(19)
第二节 唐船货物中的书籍 .....	(28)
第三节 唐船持渡书籍的出版地 .....	(42)
第四节 禁书与书籍检查 .....	(53)
第一项 禁书 .....	(53)
第二项 书籍检查程序 .....	(79)
<b>第二章 唐船持渡书的资料</b> .....	(99)
第一节 第一手资料——与贸易业务有关的记载 .....	(100)
第一项 賚来书目 .....	(100)
第二项 大意书 .....	(107)
第三项 长崎会所交易诸帐 .....	(129)
一 书籍元帐 .....	(131)

## 2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二 见帐 .....	(135)
三 直组帐 .....	(137)
四 落札帐 .....	(140)
第二节 第二手资料——编纂物 .....	(142)
第一项 刊本 .....	(142)
一 《二酉洞》 .....	(142)
二 《唐本类书考》 .....	(143)
第二项 抄本 .....	(144)
一 《商舶载来书目》 .....	(144)
二 《分类舶载书目通览》 .....	(147)
三 《购来书籍目录》 .....	(148)
四 《舶载书目》与《舶来书目》 .....	(151)
五 《唐本法帖舶来书录》 .....	(174)
六 《唐本目录》 .....	(174)
七 《御文库目录》 .....	(177)
八 松冈玄达抄写资料 .....	(198)
<b>第三章 汉籍输入的研究 .....</b>	<b>(202)</b>
第一节 大明律注释书的输入与明律研究 .....	(202)
第一项 前田纲纪的明律研究 .....	(204)
第二项 新井白石与明律 .....	(211)
第二节 德川吉宗与汉籍输入 .....	(217)
第一项 绪言 .....	(217)
第二项 德川吉宗与高濂学山 .....	(221)
第三项 深见有邻对《大清会典》的翻译 .....	(223)
第四项 德川吉宗与明律研究 .....	(234)
第五项 获生北溪的《唐律疏议》校订与沈燮庵 .....	(247)
第六项 地方志的收集 .....	(253)
第七项 《古今图书集成》的输入 .....	(292)

第三节	宽政至化政年间的新渡书与御用书·····	(308)
第四节	天保至江户末期的新渡书与御用书·····	(336)
第五节	关于“御役人样方御调书”的考察·····	(352)
第一项	御役人样方御调书·····	(352)
第二项	长崎奉行及其他长崎地方官员的特权·····	(378)
第六节	江户时代集帖的输入·····	(387)
第七节	江户时代《大藏经》的输入·····	(403)

## 附篇 赴日清人及船只与日中文化交流

<b>第一章</b>	<b>享保年间来航唐人的研究·····</b>	<b>(417)</b>
第一节	享保年间的日中关系·····	(417)
第二节	关于信牌·····	(420)
第三节	信牌名义人的变更·····	(425)
第四节	新加信牌的获得者·····	(436)
第五节	临时信牌和医生、僧侣的渡来·····	(445)
第六节	《雍正朱批谕旨》与日本文献中有关唐船头的记录·····	(459)
<b>第二章</b>	<b>江户时代前期来航的中国商船·····</b>	<b>(470)</b>
第一节	绪言·····	(470)
第二节	《唐船之图》及其作者·····	(472)
第三节	《唐船之图》中的唐船·····	(474)
第四节	其它唐船图·····	(489)
第五节	唐船船员·····	(493)
第六节	唐船的出发港与航行时间·····	(500)
一、	出发港不变之例·····	(500)
二、	出发港变动之例·····	(502)
第七节	唐船的修理与建造·····	(516)

#### 4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书后私语	(520)
图表目录	(527)
人名索引	(529)
书名索引	(552)
船番号索引	(593)
参考文献	(608)
译后记	(616)

## 中文版序

1945年8月15日这天，我身处设在大阪市内中部第22部队陆军兵营之中，当时年仅19岁。日本陆军为了所谓的“本土血战”，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为19岁。我于前一天应征入伍之时，正遇上美国空军的最后一次空袭，兵营的北端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就在这块地方，后来发掘出难波宫遗址，现已成为著名的史迹公园。

入伍之前，我在旧制浪速高等学校读二年级，如果按照现在的学制，相当于大学二年级学生。进校不久，马上被分配到工厂，夜以继日地制造武器。每月仅有一次，趁着夜幕赶到讲授日本史的老师家中，与高年级学生一起参加读书会，所用的教材是江户末期学者吉田松阴所著的《讲孟余话》。

吉田松阴是一位提倡尊皇的幕末志士，明治维新前夜死于狱中。这位历史人物在战争期间备受尊崇，当局认为有助于提高士气，岩波书店顺势推出吉田松阴的全集。

在这个读书会上，我对高年级前辈充满国粹主义的发言尚可理解，但对《讲孟余话》的内容却茫然无知，内心十分焦急。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个中奥妙：《讲孟余话》是吉田松阴在讲解《孟子》之余所发的议论，没有读过《孟子》其书，怎能理解《余话》之妙？进而又认识到：无论是多么偏激的国粹主义者，中国的古典知识是学问的基础所在，如欲研究日本，必先熟悉中国。经历了战败之后，我将中国学定为自己将来的研究目标，从而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

在中国古代史中，我对汉代史，尤其是汉代法制史产生了浓厚

## 2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兴趣。大学毕业升入研究生院时，劳翰教授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传入日本，我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居延汉简的合作研究，开始接触大量的汉代简牍，这项工作从未停止过，至今仍在为解读悬泉置汉简及平湾汉简而不懈努力。

除此之外，自1963年开始参加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从事儒学教育之私塾的合作研究，由于这一课题与吉田松阴的《讲孟余话》颇有关联，因而时时回忆起高校时代读书会的情景。

在上述合作研究过程中，我对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们如何在闭关锁国时期接触到中国的最新学说感到迷惑不解。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认为必须弄清当时的儒学家们究竟阅读了哪些中国书籍。也就是说，只要查明锁国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籍的种类和数量，那么上述疑问就会涣然冰释。

然而，当我在检索前辈学者的成果时，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于是，我开始到日本各地搜集资料，并在收获颇丰的情况下进行资料整理。我感到，这些伴随贸易进程而产生的文字资料，作为贸易关系的资料进行整理最为有效。采取这一研究方法以后，我将最初从儒教以及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的书籍，定位为舶来物品的一种，从而对贸易史产生浓厚兴趣。

比如，来到长崎的中国船只一年有几艘？有多少船载有书籍？书籍占船中货物的百分之几？当时中国的贸易船是什么形状？输入书籍要经过哪些手续？以将军为首的权贵是否买书？书价又是多少？属于贵还是便宜？流通渠道是否顺畅？日本人购买何种书籍居多？售出的书籍有否被阅读？内容是否被理解？江户时代输入的书籍有哪些保存至今？我们能否亲眼一睹？

上述问题使我的视野从贸易史扩展开去，重新将书籍作为文献学和思想史的对象加以考察。由于当时日本将中国船称作“唐船”，将唐船载来的书籍称作“持渡书”，所以“唐船持渡书”便成为我的研究课题。

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须实地踏查各地文库,一一检看古本旧籍,通过不懈的努力,求得实证的结果。与精密而敏锐的纯理论研究不同,这种实证研究需要顽强的精神和时间的积累。犹如体格强壮的农民用汗水换来丰硕的收获,这种实实在在的成果不同于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所构筑的空洞谈论。

在最初阶段,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个案研究,逐渐地相互渗透交融,接近尾声的时刻,令人惊异地搭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崭新的世界。持续不断的辛勤耕耘,最终获得了满意的回报。

日本战败之际,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从事不受时流影响的坚实的历史学研究。致力于研究作为《讲孟余话》文化背景的中国思想,是如何与吉田松阴以及同时代人邂逅的历程,现在,我的初衷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青年时代萌发的愿望,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实现。面对这块亲手开垦的园地中花开果结的景象,我感到由衷的满足。现在,这部叙述日本蒙受中国学恩历史的拙著,经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诸先生之手译成中文,可供广大中国学人阅读,如果此书能够成为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回报,对著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最高的荣誉。

皇学馆大学大学院教授 大庭 修  
大阪府立近飞鸟博物馆馆长  
1997年8月

本 篇

书籍输入及其对日本  
文化的影响

## 序章 日本的汉籍输入

### 第一节 研究角度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媒体是人和书籍。这里所说的人，主要是指从日本前往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以及从中国东渡日本、并留居日本的渡来人。这些渡来人将掌握的学问、知识以及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带入我国，并向其学生传授，影响与他们交往的人。

与以人为媒体的文化传承相比，书籍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难以刻缕入微。例如前者可答疑解惑，或可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因人施教，但对书籍却不能有此奢望。当然，一次性传入的书籍通过辗转抄录会对广阔的区域和漫长的年代产生影响。我们至今不是仍在阅读平安时代的抄本吗？

在考察书籍所产生的影响时，必须了解在什么时候、有什么书籍、有多少数量传来日本。这是研究中国文化传播日本的基本课题。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虽然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但与输入汉籍的浩瀚数量相比，则可谓寥如晨星。在此，笔者试图参照既有的研究成果，以时代为序作一描述。但输入书名的列举将控制在最小限度，因为频繁地罗列书名只会招致不必要的混乱，还不如举出可资查证的资料或提出问题之所在。我期待着该研究今后能不断发展。

我国古代传说中有关书籍的记述始见于《古事记》应神天皇

条。相传，和迩吉师(王仁)自百济携来《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时至今日，也许不会再有人将此传说误解为历史事实，例如认为日本在此之前尚无书籍，或此时传来之书只有《论语》和《千字文》两书。不言而喻，书籍的传入肯定早于此时，《日本书纪》应神纪中就有皇太子菟道稚郎子随王仁研习诸典籍的记载。在此，我想以王仁传说为例，昭示在研究汉籍传入课题时把握问题的一般方式。

其一，书籍传入的线路。

就王仁所传之书而言，它的传日线路无疑会途经百济，即朝鲜半岛，但肯定还存在着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入日本的通道，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一通道开创于何时、又是如何被开创的。

其二，书籍传入的方法。

据《古事记》记载，王仁之书是百济应日方之请，以朝贡方式传送给我国的。在研究其他汉籍的传入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传书之人是否日本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外国人携书来日还是日本人去彼地求书而归？它是作为单纯的贸易品，还是因为它与传书人的某种关系，或如同下面将要提到的吉备真备和玄昉那样，由于某种学术渊源而传入日本。

其三，传入了什么书籍。

王仁所传之书是《论语》、《千字文》，而在研究其他汉籍时，我们就会遇到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在某个时期，有何种书籍同时传入日本？此书是首次传入还是再次传入，是已经传入还是尚未传入？

5 其四，传入书籍的书志学意义。

就王仁所传《论语》、《千字文》而言，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例如它们是朝鲜抄本还是中国抄本？如果《论语》有注的话又是什么注？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版本和版本体系的问题。

参照王仁传说，我们可以提出上述四个把握问题的一般方式。倘若离开王仁传说，还有另一种提出问题的方法。例如从《万叶集》和《日本书纪》等古典作品中具体引用的书籍，或者从其与古典